

武
汉
大
学
学
术
从
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王兆鹏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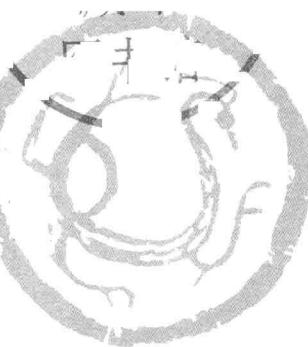
宋代文学传播探原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研究》的成果

宋代文学传播探原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 汉 大 学 术 从 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王兆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代文学传播探原/王兆鹏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6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ISBN 978-7-307-10592-8

I . 宋… II . 王… III . 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宋代
IV . 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6301 号

责任编辑：胡程立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支 笛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cbs22@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20×1000 1/16 印张：25.75 字数：365千字 插页：3

版次：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7-10592-8/I · 693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不得翻印；凡购我社的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自然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晓红

副主任委员 卓仁禧 周创兵 蒋昌忠 李斐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文习山	石兢	宁津生	刘经南
李文鑫	李晓红	李斐	李德仁
吴庆鸣	何克清	杨弘远	陈化
陈庆辉	卓仁禧	易帆	周云峰
周创兵	庞代文	谈广鸣	蒋昌忠
樊明文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李健

副主任委员 冯天瑜 骆郁廷 谢红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李健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骆郁廷
郭齐勇	顾海良	黄进	曾令良
谢红星	谭力文		

秘书长 陈庆辉



王兆鹏

1959年生，湖北鄂州人。1982年湖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1997年硕士毕业后至南京师范大学师从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199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晋升教授。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李清照辛弃疾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湖北省古代文学学会会长、《文学遗产》编委、《宋代文学研究年鉴》主编。出版《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两宋词人年谱》、《唐宋词史论》、《词学史料学》、《两宋词人丛考》、《词学研究方法十讲》等词学专著十多部。近年致力于文学传播和数字化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唐宋文学编年系地信息平台建设》。

文学传播研究的想象空间

(代序)

肖鹏 王兆鹏

肖：兆鹏兄，认真拜读了你的《宋代文学传播探原》书稿，很开眼界。许多内容都是我以前不知道，或者只是模模糊糊知道一点的。你做了一件很有开拓意义的工作：描述生态。唐宋文学赖以生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土壤，由此清晰地——至少是部分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用电视的术语来说，你为读者提供了“情景再现”。

王：谢谢鼓励。你在传媒界工作，多年研究大众传播，对现代传媒十分熟稔。以现代传播的眼光，回过头来观察古代的文学传播，一定会有更深入的思考和发现。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有一些想法也希望与你交流。

肖：我们通过网络电子邮件、QQ 聊天这些现代传播技术，谈论非常遥远的传播历史，很有点梦幻的感觉。我们不是像父辈那样坐在一起面对面地交流学术，而是远隔千里，一来一往问答笔谈，这本身就是一个传播学现象。

王：作为同门，特别想听到你的批评和建议。

肖：我注意到你的书稿中，许多篇章结束之处都留了一个没有完结的话题口。比如第三章谈论题壁的结尾是这样的：“本文只是对宋代题壁做了一些史料的梳理和现象的分析，学理性的深度阐释，还有待来日。”又比如第五章谈论润笔的结尾：“至于文学商品化的其它表现形态及其对宋代文学的影响，尚需专文探讨。”第七章谈论传播效应的非文学因素时说：“至于清代以来李清照和朱淑真声名、地位的变化，留待今后再讨论。”你这是不是要告诉读者，这本书的许多研究，仅仅是整个宋代文学传播课题的一部分，还有更多的探讨没有展开？

王：我这是一部论文集，其中的各个篇章都不是同时写成的。前后写作的时间跨度将近二十年。宋代文学传播是一个大课题，其中大多数地方我还没有涉及，即使涉及也没有思考透。这本书里谈论的，仅仅是宋代文学中一些比较重要、比较宏观的观察点。传播个案的论述，也只是举隅的意思。这些研究成果，充其量只是阶段性的展示、探索性的思考，谈不上系统完整的观察与研究。

肖：恕我直言，有许多我认为很重要的观察落点，或者学术界谈论的热点，你都没有涉及。比如文学选本的传播、诗话词话的传播、书坊刻书的传播，你都没有谈到。个案研究里面，你选择了两个过去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案例：李清照与朱淑真的传播对比、王维《阳关三叠》的历代传播。但像柳永曲子词传播这么经典的案例，你却没有涉及。是你有意避熟就生，尽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还是你的学术性格中好奇求新意识的表现？

王：的确如此，我这本书只是选择了有关宋代文学传播方式的几个问题进行探索，远远谈不上对宋代文学传播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我治学，有些“喜新厌旧”，总是想探讨新问题，试用新方法，摸索新路向，所以不断地转移“战场”。一个专题探索了一阵子，又发现有新问题、新领域，于是“见异思迁”，转而去探索新发现的问题和领域了。因为多点作战，多面出击，所以每一个点、面都做得不完整、不系统。我也知道这样做，有得有失，但做学问，本是凭兴趣，我要享受做学问的兴趣和乐趣。所以，听由兴趣

的转移，让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路向跟着兴趣转向调整。生活中的束缚本来就很多，如果做学问还要“心为形役”，不能由着兴致来，那做学问就未免无趣了。

肖：我知道你的学生谭新红教授最近出版了《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一书。他的研究范围主要是宋词，书中有的章节内容与你相同或相近，如歌妓唱词、题壁、刻石、别集、传抄。有的是他所独有的，比如宋词的诵读、题画、选本、词话、词集序跋、私人藏书、销售贸易、书价、驿递制度、邮寄传播、误传与失传。有的与你的角度不同，比如你谈论的是印可，他谈论的是品题。两种说法，大致是同一个文化现象。

王：谭新红的《宋词传播方式研究》，是宋代词传播研究的重要收获，涉及的问题比我这本书要广泛。我是希望他走自己的路，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和优势，不要重复我的路子。

肖：除了谭新红之外，你周围是否有学术团队在研究文学传播？你们之间有没有不同的学术分工？这样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独自探索，需要漫长的周期。

王：是的。对于文学传播，我个人只是做了一些探路性的工作，像勘探找矿的地质队员，找到矿藏后，就让别人来开发。我摸索过或意识到哪里有深入开拓的空间，就有计划地安排门下博士生来深度开掘。因为我想做的东西太多，总是不断转移学术的兴奋点和创新点。我也意识到这样做的缺点：每个专题都没有做大做强。如何既能不断创新，又能把每个创新点做大做强，我还没有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毕竟有限，所以我越来越体会到，人文科学的研究跟自然科学技术研究一样，也需要团队的合作。我的团队，主力是门生。你刚才提到的文学选本的传播，我是让门下博士邓建来做的，他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宋代选本与文学传播；而石刻，也是宋代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于是让另一位博士王星来做宋代石刻与文学传播的博士论文。至于唐代文人的传播意识，明代词作传播方式的变化等，则分别安排门下黄俊杰和汪超等博士来做（近几年我指导的博士生，博士论文选题基本上是我统一规划安排）。这几部博士论文都做得不错，获得论文评议专家和答辩

委员会委员的高度肯定。所以，我计划将这几本博士论文连同我这本书形成一套《中国文学传播史研究丛书》出版。我的学术布局是先做点的深化，多点并进，逐渐形成线、面。点、线、面清楚后，我们才可能对一个时代或几个时代的文学传播状况、传播过程有比较完整的认识和了解。

肖：很佩服你的这种战略能力。传统的治学从来都是单兵作战，就像钱锺书所说的“荒江野老三二素心人”。能够将优势资源整合成为一个整体，需要有特殊的把控能力和宏观意识。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就是用了几位一流的史学家，合力共成大事的。这与20世纪学界盛行的集体编写文学史、集体撰写鉴赏辞典，不是一回事。

王：对。农耕社会的学术研究，以学者个体的脑力劳动为主。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几乎所有的领域都开始需要规模化的社会合作。波音飞机部件的生产组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大规模合作，是典型的例子。我们古代文学的研究，也应该逐渐适应这种潮流，从个体劳动走向多人合作、规模化合作。但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你那个领域里的顶尖专家。

肖：我们不约而同，都走了全力还原历史、寻找历史原生态的学术路径。我在拙著《宋词通史》里提到了德国史学家兰克的叙事史学，提到了他的名言：“历史要写得像过去发生之事一样真实。”你在书中也强调说：“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包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既需要考察社会政治、经济的大背景，还需要关注作家个体的生存状态，了解他们的经济来源和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宋代作家经济来源之一的润笔，我们更要了解宋代的润笔制度及其影响。”谈论经济来源和物质生活条件，让我们可以对遥远的过去看得更清楚、更逼真。这是过去学界所忽略的领域。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这样的还原历史仍然是唐老他们注重实证的学术传统。

王：感觉上，你比较侧重于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比如词人的健康、相貌、婚姻、性格、交游、嗜好、疾病、心理等。而我更有兴趣发掘那个时代不同群体的生存状态，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原始面貌，他们的生活方式、娱乐方式，是整体还原创作现场。

肖：应该说你更宏观，也更逼近历史。就像电影导演，我关注的是演员的性格形象，你更关注环境场景、典章制度、风俗起居。读完你的书稿有一种想法，不知道把你的这本书理解为《宋代文学传播史》的简要概论，是否可以？

王：恐怕不行。传播学是一种观察角度，一种理解历史的理论工具。可以拿它来叙述历史、分析历史，但本身成为历史就太庞大无边了。要写成《宋代文学传播史》，必须包含所有主要领域、主要对象、主要传播个案。我们做过这个课题的论证规划，它所涉及的内容实在太浩瀚，考虑到还有如此多的领域没有开发研究，甚至连资料保存情况都不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传播史或者通论，都是冲动的、不理智的。《宋代文学传播史》如果写成这样，读者是无法接受的。我觉得，要写《宋代文学传播史》，至少还得学界十年八年的共同努力。要写《中国文学传播史》，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和探索。

肖：谈到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与你商榷。你这部新著史料文献特别扎实，但如此大量的陈述事实，给人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阅读印象。是不是你的文学传播研究，充分利用唐门文献考证的功力优势，侧重于历史资料的汇集？鲁迅曾经批评郑振铎写的文学史像个资料长编，缺乏史的论述。你的课题研究是否也有这种问题？请原谅我的质疑。

王：你提的问题很尖锐，也很实在，借辛稼轩的说法是“实中予痼”。我这部书稿确实偏重于文献资料的发掘整理。谭新红的《宋词传播方式研究》也大致如此。我不知道这个漫长的文献资料发掘阶段还会持续多久。可能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种文献资料整理发掘还是我们的研究重点。但正如前面说过的，这不是课题的全部，也不是最终的成果，只是阶段性的成果。特别是本书的下编，更是如此。我原来是计划将两宋时期传播的词集目录版本全部汇考，在此基础上，再对两宋词集的传播观念、传播方式、传播过程作一宏观分析，由于我的研究计划不断改变，没来得及完成最初的设想和计划。下编原本是进行宏观分析之前的建筑工程，如今这建筑工程还没完工，宏观上的学理分析更没来得及做，故给人以述

而不作的印象。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我们的研究进展和学术能力之间，毕竟有一定的距离。

肖：注重文献发掘，是你治学的学术特长，也是你多年来坚守的学术风格。治学方法可以有不同的选择，学术风格可以多种多样，我们可不可以允许用理论演绎的方式，或者泛泛举例子的方式，或者纯粹叙事的方式，来研究古代文学传播？你对文献发掘的坚持，有没有别的考量？

王：是有纠偏的意识。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和进展，但也存在一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就是缺乏实证，观念先行，满足于套用传播学等理论，预设一个文学传播的框架，然后找几条不痛不痒、似是而非的史料予以证明完事。不想花大力气在浩瀚的原始文献中去耙梳史料，不是用文献史料说话，而是用主观的设想来演绎文学传播的历史。所得结论，是否符合历史的真相，就很难说了。我做传播，是先从史料入手，尽可能地充分占有史料。从对材料的归纳和分析中窥探文学传播的历史真相。我写这方面的论文，既力图解决一些文学传播的具体问题，也希望能够为研究者提供一些可以进一步探讨的新史料。这些史料，有的是直接引录原文，有的是提供史源线索。

肖：你担忧的这些问题，让人想起当年许多老辈学者对胡乱套用西方的新观念新方法解释古代文学嗤之以鼻。就是因为这种生硬的套用不落地，没有扎实的文献史料发掘为基础，敷衍取巧，让历史迁就于他的理论。结果总是空头理论与模糊历史两张皮，糅不到一起去。你的传播学研究刻意注重实证，与传统的本土学术融为一体。很传统，也很现代。如今电子文献资料日趋丰富和方便，充分占有资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情。有些年轻的学者不太注意使用第一手原始文献史料，喜欢东摘西抄玩空手道。这里面有一个治学态度的问题，是不是？

王：现在数字化的古籍文献资料，确实很多，方便到我们的前辈无法想象的地步。但现有的数字化古籍在检索功能上还有它的局限性，它只能是关键词的对应检索，还不能智能化的检索。比如在《四库全书》电子版中，用“传播”二字做关键词检索传播资料，

只得到 691 条检索结果。其实，《四库全书》中蕴含的传播史料，何止千条万条！有传播意味而不含“传播”二字的资料，还无法检索得到。跟现存的纸质古籍相比，能全文检索的数字化古籍还相当有限。最关键的还在于，检索到的文献资料是被分割肢解的零碎资料，不是从文献“现场”提取的有机史料，不广泛阅读原著，不认真研读第一手文献史料的来源，很难形成对史料“现场”和背景的完整认识，也就很难真正“还原”历史现场、历史生态。所以，我一再提醒我的学生，要充分利用数字化古籍的检索手段，但不能完全依赖检索到的文献史料。数字化古籍目前还只能是一种辅助性手段，而不能成为文学传播历史研究的主要依靠。

肖：文学传播研究资料的整理发掘，你们有什么具体规划？

王：我大致拟定了“三步走”的路线图。第一阶段是大规模的文献汇总整理，也就是要充分地清理出文学原生态现场，掌握第一手完整的资料。想出版文学传播资料长编，然后进行史的叙述和理论的发挥。在没有掌握完整资料的情况下，任何理论判断和观察都是不可靠的、不完整的。我们的课题规划中，第二阶段的工作才涉及理论研究。第三阶段才能谈论各种类型的专史编撰。

肖：出版文学传播资料长编，是个不错的想法。你们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想法或者进展吗？

王：还没有形成具体的操作方案。因为传播资料的范围太宽广了，如何确定它的边界是个问题。传播资料，有直接的，有间接的，有显性的，有隐性的。用传播的眼光去看文学文献，似乎都有传播的意味。比如一首酬赠唱和的诗篇、一封书信和一篇为书籍写的序言，都是传播行为和传播意识的体现。有没有必要把这类诗篇和书信全部汇辑？怎样确定文学传播资料的范围，我还举棋不定。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肖：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对此没有深入想过。但是如果我现在着手研究文学传播，会自然而然想到需要某些类别的参考资料。换句话说，资料长编应该从研究者的需要和可能来考虑。最先应该选择的，当然是最狭义最主要的领域，比如涉及文学作品传播的朝廷诏令禁令、制度机构、正史野史的传播记载、风俗社集、媒介形

式、重要序跋、重要文学事件、政治事件、典型传播人物、唱和活动、书籍版本、技术工艺等等。广义的和边缘性的资料不是不重要，而是难以界定范围，可以等将来研究有了一定深度，再来考虑。或者完全放手给后来的学者自由发挥。

王：在研究力量相对有限的情况下，我想先做断代传播，也就是先汇编唐宋文学在唐宋时期的传播接受资料。如果把唐宋文学在历代的传播史料一并收集进去，体量就太庞大了，可能每一类都能独立成册。如果在做广义还是做狭义、做历代还是做断代之间选择，我觉得做狭义的断代更有价值。这个问题还需要深度论证，不能匆忙下结论。

肖：我从事电视传媒研究多年，特别欣赏你用现代传媒的现象作为参照系，再现并打量遥远的过去的做法。比如你谈论题壁，将它与现代网络的发帖联系起来对比，说：“宋人题壁，类似于今人上网发帖，具有开放性、自由性、即时性、无偿性四大特点和发现人才、反应诉求、广告促销三大效应。就像当今网上有人发帖也有人跟帖评论一样，宋代题壁诗词，也常有‘跟帖’唱和的。”这样的叙述打通了古今的生态隔阂，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别吸引人。

王：现象类比这个灵感，是在给学生上课时想到的。后来写成了文章，读者也觉得蛮有意思。那篇论文写完后，我越来越觉得，题壁和观题壁，是宋代文人日常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常态的文化生活。就像我们当今每天要上网关注社会文化信息一样。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这种古今打通和类比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我还会推及其他传播现象的研究。比如古代歌妓唱词，与今天的歌舞唱歌表演的对比研究；比如名流印可的传播效应，与今天的名人广告、名家作序的对比研究。除了古今对照之外，跨学科的彼此参照，也很有意义。宋代大曲、转踏的传播学研究，可以将文学与戏剧研究结合起来，形成边缘交叉地带。《宋史·乐志》里面那么多颂德的郊庙祭祀作品，很多都是大晟府制撰官的手笔。朝廷祭祀礼仪也具有传播学的研究价值。

肖：现代概念的传媒，已经与古代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书

籍、石刻这些已经不被看做传媒了。现代传媒主要指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户外广告、社交媒体等。时效性是现代传媒的核心要素。时效决定一种媒体究竟是朝阳产业还是夕阳产业，有生存空间还是没有生存空间。这种时效概念对古代的文学传播研究有意义吗？

王：当然有意义。我在绪论里面讨论文学传播的层面问题，将传播的内容分为当代作品和前人作品。传播前人作品，是继承传播，相当于电视节目的重播。书籍刻印的再版，谈不上什么时效性。而同时代的作品传播是当代传播，它距离创作发生的现场更近，时效性更强，有些甚至是即时传播，如当筵唱主客所作词。当然还不可能做到现场直播。除了这两种传播之外，后代读者对这些作品的传播是后续传播，属于传播史的范畴。比如我书中谈到的《阳关三叠》传播接受过程。宋人版本的考证部分，我只清理了当时的传播，也就是宋人刻印传抄的情况。元明清至现当代的版本流传，唐先生曾经做过，当然我们还可以继续研究，以期有所增补。不同传播方式的时效性，是我们观察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肖：参与性呢？参与性是当代大众传播的第一要素。没有参与互动，便是落后的媒体。谁能够提供最大限度的公民参与，谁就是当今媒体的王者。社交媒体由于拥有无可比拟的 UGC（受众生成内容）平台，而成为最受欢迎的媒体形式。如 Twitter、微博、手机短信、论坛（BBS）、MSN、QQ、Facebook、博客、Youtube、土豆、优酷、plurk（噗浪）等等。这对你的文学传播研究有没有启迪？

王：广泛的参与性也有启示。创作者与传播者的互动也是古代传播中的常见现象。宋代词人在歌唱现场听歌，受到现场演唱氛围的感染激发或歌唱者请求而现场作词，就是一种互动性参与。我在《阳关曲》的图画传播考察中提到，宋代文人经常聚集观赏书画然后纷纷题跋题诗唱和，也可以说是参与性互动。当然其规模、速度远远不能跟当下的微博、论坛（BBS）、MSN、QQ 这类现代电子传媒相比。我写作时只考虑到创作、传播与接受的互动性，而没有注意到参与性，特别是广泛参与性的传播效果，这是今后可以深入探

讨的一个路向。

肖：许多学者研究唐宋诗词，喜欢引用前人的诗话、词话。引用清人的诗话、词话问题还不太大，引用宋人的诗话、词话时，我们常常会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在第一章结尾有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在理解、分析宋代（乃至其他时代）文学批评家的观点时，必须审慎考察批评者是否掌握了对象的全部作品，他是就部分作品而言，还是针对全部作品而发，否则会引起误解。”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传播终端信息，与古人看到的传播终端信息，可能不太一样。是不是？

王：这是非常重要的传播现象。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许多词人诗人的作品面貌，与当时人的评价相去甚远。因为古人当时看到的可能仅仅是初稿，或者仅仅是单篇，或者是未经删削的版本。而我们看到的是经过千百年流传增删变形后的作品，是经过许多人一遍遍选择的结果。这就造成了古今对话的艰难。双方读到的作品数量、作品类型、风格面貌、价值观念、道德准则都不一样。因此要引用古人的评价来实现古今互动，往往有一种鸡同鸭讲的感觉，会出现语境完全不对的情况。面对这类情况，传播学的分析就显得十分重要。否则我们的文学评论都是盲目的争执。

肖：你的第六章《宋代名流印可的传播效应》，只有短短的四千字，却是一个特别好的题目。可惜很多内容没有展开，只谈到了传播效应，没有谈到对群体凝聚的效应，没有谈到对名士干谒风气的因果作用，以及对文人士大夫心态的影响。张元干曾经小心翼翼地收藏名流印可的题跋，姜夔也曾经小心翼翼地收藏名家品评。他们都是爱惜羽毛的高士，这些典型现象没有见你深入分析。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切入，古今对比，可以发现社会大众对偶像的迷信与崇拜。多好的题目啊！

王：你说的这些对我很有启发。我在思考这一传播效应时，也考虑过相关问题，但不完整，主要观察点还是集中在传播环节上。你注意到的这些连带产生的后续传播效应，是非常有价值的判断。事实上，我们谈论的每一种传播现象，都一定有它们连带产生的后续传播效应。或者正面，或者负面。分析它们的得失，我们才能更

深入地理解那个社会。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第二阶段的理论研究。

肖：读了你的书稿后，产生了许多选题联想。传播概念有广义也有狭义。广义的传播应该包括一些边缘性的文学传播现象，例如朝报变迁、干谒行卷、家塾坐馆、朝廷将诗文新曲赐赠外夷、官员出使异国的传播、大晟府与教坊制度、朝廷下诏征集天下藏书等，这些都具备文学传播的性质。广义的文学传播就是文化传播，对吗？

王：可以这么说。广义的文学传播，还应该研究反传播现象，比如传播禁忌、文字狱、社会道德底线、技术障碍、战争破坏、火灾等。南宋初年，曹勋要为他父亲曹组刻印诗文集，捐资出钱，刻版都做好了。宋高宗听说后，下诏扬州书坊销毁其刻版，就是一个例子。曹组的词滑稽无赖，朝廷认为这种文学践踏了社会道德的底线。有意思的是，宋徽宗就毫不在乎，对曹组的滑稽无赖词欣赏得很。万俟咏正好相反，自己觉得自己的侧艳词太下作，编《大声集》的时候都删削藏匿掉了。这种成对的正反现象，比较起来研究很有意思。

肖：你曾经提到过跨文本传播，认为它也是一种很突出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我了解的比较少，愿闻其详。

王：这是将文学传播的视野放大到整个艺术的领域。古人的一篇诗文，被画家绘成图画，被书法家写成书法作品，被音乐家谱成歌曲，其传播效应要比单纯的纸本传播大得多。我做《阳关三叠》的传播，就是想对诗歌与绘画、音乐之间的跨文本传播做些探索。这方面可开拓的空间还相当大。题画诗，过去只当作一种特定的诗歌题材来研究，其实从传播的角度去看题画诗，将会有新的发现。同理，从传播的角度去分析唐代入乐演唱的声诗，也会得出许多新的认识。

肖：抄写、雕印、题壁、刻石、选本、歌唱等，这些不同的传播方式和传播媒介，有先进和落后之分、便利和麻烦之别，可以分别评估它们的互动性、持久性、安全性、稳定性。效果最生动的是演唱，但是它很容易消失。刻石最稳定，纸本文献最不安全。这有

点像现代艺术中的戏剧、雕刻、绘画、园林等，有的是时间艺术，有的是造型艺术，各有不同的物质载体和表现形态。当然，它们之间有先进媒体和传统媒体之分，也有新旧高下之别。摄影出现后，传统的风景画和肖像画受到挑战。电影出现后，皮影戏和话剧没落。电视出现后，电影又受到生存的威胁。现代网络的出现，让电视、报纸、广播都成了夕阳产业。同一个文学作品，通过不同媒介的传播，最后会产生很不一样的效果。媒介之间的对比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课题。

王：雕版印刷兴起于北宋，是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不过刻书人首先拿它来刻印经书、史书、宗教类书，然后才谈得上私人的文集诗集，刻印词集是更晚的事情。单篇刻印则自由得多。题壁是时髦流行文学的最佳选择，没有人在墙壁上题写经书史书的严肃内容。这是内容对媒介的选择。我最近读书发现，宋代的图像传播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传播方式。还有民间的日用品、装饰品，也有传播的功能。比如，宋金元以来，历朝历代民间都喜欢烧制瓷枕。宋人用书法来装饰瓷枕别出心裁，所书内容有诗、词、曲、赋、格言、吉语，篆、隶、楷、行、草各体都有。它为我们今天研究民间文学和风俗文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民间的灯谜、对联、婚丧吉语等，也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当然，这些属于比较边缘的观察地带。

肖：既然刻书是文学传播的主要途径，那么宋代的书坊制度也应该是重点研究对象。宋代的书院制度，当然也是文学传播和群体集散之地。宋代的馆阁制度和馆阁藏书情况，北宋初年和南宋初年的朝廷征书事件，朝廷组织的大型类书编纂工程，都具有传播学意义。

王：你上面提到了很多富有启发的思路和建议。如果让你来写一部唐宋文学传播研究之类的著作，你会从哪些视点切入，从哪些方面展开？你理想中的唐宋文学传播著作是个什么样子？文学传播，还有哪些新问题可以研究，哪些新角度可以切入？

肖：作为学者，我对这个领域缺乏研究，写不出这样的著作。但作为读者，我会对这个领域有许多不同的阅读渴望和想象空间。